

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陶渊明

王华超

陶渊明生于公元 365 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少年时，他就豪放不羁，志向远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他曾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写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写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记载了陶渊明 29 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宣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他任职后，给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写信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送给你们一个服役的人，帮助你们耕种田地。他也是人呀，请你们好好待他。”

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后来，他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是说，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乐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这篇文章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情真实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曾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

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回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混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回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

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在陶渊明深层心理中，存在着二重人格。一是理想人格，一是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主要源于家族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其内涵是以任怀得意、追求入世功业与世外超逸相结合，解决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之矛盾。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与时代并无二致，他并无超出同时代人之处，其平生矢志乃指此一层面人格失落而言。陶渊明与同时代士人迥然不同之处表现于另一层面人格，即现实人格上。现实人格首要因素是他的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这一倾向源于陶氏家族没落及陶渊明一支于陶家中卑微地位所引起的诗人心志失落与不平，因体质羸弱一生疾患所形成的自我关注和自受及因此所引发的与现实环境不可调和之矛盾。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决定了渊明一生无论出仕与归隐，都摆脱不了人生孤独的困境。然而，也正是现实中的孤独矢志使陶渊明从历史中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归宿，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又与陶渊明现实人格中另一因素，即对优越感的执著及与之相关的人生诗意化个性倾向相联系。心理学研究发现，对人生优越感的执著与个体自卑情结有关，即自卑情结乃追求人生优越感之前提和基本动力。在陶渊明一生中，有三个因素导致他形成自卑情结：一是家族双重式微；二是曾祖陶侃不可逾越的偶像地位对作为陶家子弟的渊明的影响；三是自身体质羸疾。自卑情结的形成使陶渊明一生始终贯穿着自我拯救、不断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便化作在人生优越感驱动下的自我理想化和生活诗意化。这一倾向又与其人格理想相结合，于是，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一位于困境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于贫病交加中“融然远寄”的诗人和他的乱世中优美如画的田园诗及末世中的桃花源。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

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以前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除了《诗经》中少数农事诗以外，他大约是首先将大量的农家的生活和劳动写入诗歌，扩大了诗的创作内容，开创了田园诗派。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在《归去来兮辞》中，诗人用神来之笔把和平恬静生活款款描绘，充满画意的想像。浪漫的情怀，清丽的语言，流畅典雅的风格，使这篇文章被北宋欧阳修推为晋代第一。

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

《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这些诗中激情的流露是诗人心中济世热情的最后的闪光，是陶渊明诗作中光辉夺目的另一方面。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凶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陶诗的诗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交融。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如《饮酒》之五，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的启迪。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钟嵘《诗品》评价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钟惺的《古诗归》也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爱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

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沈德潜《说诗啐语》云：“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

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出自我国屈原以后的又一伟大诗人、晋宋时代杰出的诗辞散文大作家陶渊明的手笔。《桃花源记》即《桃花源诗》前边的记。记，是一种文体，为记述事物的文章，其后是一首五言古诗，“记”又相当于该诗的序。故《桃花源记》又叫《桃花源诗并序》。它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奇葩，传诵千古而不衰。那么，陶令公写这篇名记的动机和思想来源何在呢？这与陶渊明的身世有关。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换代之际，社会矛盾尖锐，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加之，他对东晋的黑暗现实不满而归隐，于是越来越坚决地否定自己所处的社会，不断构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图景。《桃花源记》就是他亲笔绘出的理想社会图：环境优美，怡然自乐。在这样的理想社会，没有君主，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欺诈。人们淳朴厚道，和睦相处，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这就是陶渊明以浪漫主义手法写的世上乌有的桃花源。这个桃花源理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宁静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抗议和憎恨。写桃花源里“靡王税”的安乐，正是要说明现实社会君主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陶渊明因为自己的理想、抱负已在现实生活中破灭了，而又耳闻目睹了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愿望，才写出了这篇划时代的杰作。

当然，陶渊明写出这篇杰作，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一些学者指出，《桃花源记》的产生，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受老子、庄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影响。他们说，在原始社会，人们都“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二是受了魏晋以来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嵇康说：“刑本禁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阮籍说：“盖无君而遮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主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鲍敬言创“无君论”，认为君主是社会一切丑恶、灾难的根源。他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荣，无荣无辱。”这种言论，反映了农民阶级对残酷的封建统治者的抗议，表达了广大农民希望摆脱一切剥削压迫而过安居乐业生活的要求。三是受了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养也，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陶渊明的确潇洒得很、飘逸得很。鲁迅先生称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还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丝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鲁迅先生的评价一点不错。后世之人仰慕陶渊明的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一个真能象陶渊明那样活法的。大起大落，一生坎坷的苏东坡，虽然也很飘逸，“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但终不及“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陶渊明来得自然，陶渊明能够“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苏东坡能吗？陶渊明的飘逸，实在是令人难以模仿的。古来飘逸的隐士很多，但没见谁能象陶渊明这样，生前就为自己写好了《自祭文》，唱

出了“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大彻大悟。人们都很忌讳死，但是陶渊明不忌讳，他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所以后人对陶渊明的生死观就更加盛赞不绝。陶渊明一段“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何等的自悟而省人；一段“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以易安”，又是何等的自得其乐；一段“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又是何等的无限感怀；“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又是何等的潇洒飘逸！

陶渊明之伟大，主要是作品与人品的融和，其文学之特色，代表诗人之人格、情操。因有渊明之人格情操为骨干，乃能成就渊明伟大而杰出之作品。渊明主要作品，共有诗一百二十五首，散文七篇，辞赋三篇，辞采精拔，内涵丰美，故能独超众类，超迈千古，为后代评论家，交相赞誉。而渊明作品之独特风格表现在：第一，诗歌，胸中之妙，自然流露，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魏晋诗坛，风采突出，为我国古典诗，开创一新天地，拓展一新境界。第二，散文，词采精拔，独得灵均、长卿之风，尤以《桃花源记》，文学境界高、文学情味浓，为绝妙之上品。梁启超说：“唐以前第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算是极有价值的创作。”第三，辞赋，格高意远，上接风骚，尤以《归去来兮辞》，无论就作者之素怀，辞赋一身之文采、情韵、章法、结构等，确保称逸品而无愧。清黄本骥赞：“谓之超越秦汉，上接（风）（骚）可也。”

陶渊明之人德，早为人看重。梁钟嵘诗品卷中云：“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萧统《陶渊明集序》云：“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生。”陶渊明的伟大人格，在漫长的历史中广泛地活在人们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先是他那不慕名利，不与污浊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他宁可下地种田，过苦日子，也绝不屈心抑志、汨泥扬波，可谓品高云天、出污泥而不染，凛然特立，令人肃然起敬。其次，他提出一

个桃花源的理想社会。在那个桃花源世界里，“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人人都有田可耕，自食其力：“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劳动收获归劳动者所有、完全没有压榨掠夺。它喊出了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民众摆脱压榨的心声，不时激起人们的期望与憧憬。其三，化迁的宇宙观、神灭论和委运自然的人生观，构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世上只有天地和山川是永恒的，万物依照其“常理”荣悴代谢，形尽神灭，人生不宜过多思虑，应该听任自然的变化，不喜不惧，了此一生。其四，他不仅有高尚人格和理想，拥有一个崇高的精神王国，而且还有高超的艺术作品，拥有一个迷人的艺术世界。

在四、五世纪间，中国江南上空高悬着一颗新星，以独特的光芒照耀着当时的文坛，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闪烁着不灭的光辉。这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文学史上“头等人物”的陶渊明。在我国悠久漫长之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最久之诗人，似乎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四家。他们是旷世难遇之天才，而又有崇高伟大文学创作，是我国文学史上超迈千秋流芳百代之“巨人”。而陶渊明被称颂为“千古绝高的人物”，“伟大的巨人”、“黑暗时代的一颗巨星”、“我国韵文的巨擘”、“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人之祖”、“歌咏自然的诗豪”、“平民文学的代表”、“歌咏田园的民族诗人”、“真正的农民文学家”等等，已成为一超越时空之人物。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云：“陶渊明作诗不多，就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徐经等推陶子之道应进孔氏之门。朱自清先生说：“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日本学者叶雨伯阳在评估中国古代诗人的历史地位时说：“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从古远的上代直至今天，不论时光如何流逝，各个时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们对于他恬淡高洁的人格之憧憬，对于其诗文的无限热爱从未中断。它长期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正由于渊明之伟大，在《晋书》、《宋书》、《南史》中皆有传，一人列传三史，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先生，真乃千古一人。